

他的 2500 张大画幅照片中 有老城厢过去的样子

2022年，历经 30 年的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宣布全面完成。这一年，摄影师曹建国已经拍摄老城厢 18 年了。

文 / 晨报记者 姜天涯 图 / 曹建国



四牌楼路·方浜中路口·四牌楼以北 2017年6月13日

一

拍下这些照片的，是大画幅摄影师曹建国。拍了老城厢 18 年，但他却并非生长于老城厢。

曹建国小时候住在虹口区四达路一带的公寓房，一家人居住面积有 100 多平方米。

1950 年代每逢春节，母亲都会带家里四个小孩去老城厢走亲眷，到曹建国外公的弟弟家做客，小孩们喊他“城里阿公”。

神秘感是初识老城厢的曹建国的第一印象。“因为格里向房子、街道、弄堂都是七拐八拐的，而且老窄小的，依走错一条弄堂，就不认得路了，寻不着地方了。”

“都是母亲带着我们去的，如果让我们自己走，我们走不进去，也出不来。”

城里阿公家位于丹凤路门面房，10 多平方米的屋子既是裁缝店，也是一家人的住所。

“过去年辰拿所有物事都拆脱，唯一一张做生活（做生活：工作）的八仙桌摆在当中，两边都是床，阿拉就围着八仙桌坐下来。”

过年这一顿招待客人的宴席，空间局促而菜色丰盛，母亲祖上宁波人，少不了一道鳗鲞，还有黄鱼、红烧肉、鸭子、炖鸡。“宁波人的习惯，再穷不能亏了客人。”

对幼小的曹建国来说，他未曾见过这样的世界。“一个房间里又是吃饭，又是大小便，又是睡觉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生活环境。”

这种神秘感和见到新世界的感受，构成了曹建国对老城厢的初印象。

1986 年，曹建国成为摄影家协会会员，2000 年，他进入摄影家协会工作，喜欢用 8x10 英寸大画幅相机拍照片，最初拍摄的是虹口的老房子。

2003 年，他在闵行路拍摄的时候，听一个路人说老城厢董家渡、王家码头路已经在拆了。“我一记头醒悟过来，改变了自己的拍摄方向，马上就把镜头对准了老城厢。”

他跑到董家渡一块去看，已经在拆迁了。“动迁速度太快，已经拆脱交关了。我已经是

晚了。”

这一时期的拍摄，跟着拆迁方向走。拍王家码头路和董家渡的时候，他听说露香园路、万竹街也要开始动迁了。“我马上调头到西北角，露香园路我开始抢了。我想啥地方开始拆，我肯定先要抢格地方，否则顾此失彼。”

在曹建国的拍摄点位图中，可以看到露香园路留下了很多红点，那都是他拍摄过的位置。

在拍摄过程中，他翻阅老城厢的历史资料。过去不曾了解的历史，慢慢贯穿进他的拍摄计划。

在拍摄老城厢西北角旧仓街、大境路一带时，他查到历史上，这一带曾为“九亩地”。九亩地，是个历史地名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。清嘉庆年间，在青莲庵东南侧辟演武场，占地约 9 亩，称作“九亩地”。以后此间开设积谷仓、硝磺局、改过局及刑场等。

《大境路·旧仓街十字路口以西北》这张照片记录了 2007 年的“九亩地”，“这栋房子带有一些圆形，里面设施很好，已经有灶披间、抽水马桶和浴缸了，通过建筑就能看到当年的老城厢应该相当繁华。”

从 2005 年开始，曹建国的拍摄有了系统性，开始注重建筑的地标、路标。

他把老城厢的地图放大，按图索骥，一个路口一个路口扫荡式拍摄。每一张照片都留有清晰的拍摄方位、朝向和日期记录。

“老城厢是一个鹅蛋形，正好复兴东路、河南南路在老城厢中间走了一个十字，刚好分成四块。”

目前，曹建国的作品正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展出，展览即是按照老城厢在十字的四个象限为板块划分的。

曾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论文《基于高密度理论的上海老城厢改造策略研究》也提及了老城厢的这种区划办法。

如果从空中俯瞰老城厢，复兴东路、河南南路构成了纵横两条明显的分割线。

在这个基础上，曹建国的照片以“东北·福

佑片区”、“东南·乔家路片区”、“西北·露香园路片区”、“西南·文庙片区”构成四个板块。

以此，曹建国完成了《老城厢市井》的系列拍摄。

二

《老城厢市井》的拍摄主体是建筑。在这一系列中，很少能在画面中看见人，这是曹建国拍摄老城厢的特色。

这些照片像今天老城厢的真实，居民动迁，房屋空置，街区里空空荡荡。

如果十几年前来看这些照片，会有一种真实又虚幻的感受。因为老城厢给人的感受曾是闹猛、喧嚣、人多。

但曹建国在这一系列的拍摄中，刻意规避了人，他认为这是一种摄影风格，尤其在大画幅摄影领域。“这种风格是对建筑、环境的一种很深刻的记录，是摄影中一种特有的表现方式，很冷静、很沉默，在没有人的环境下，注重建筑的特质。”

大画幅可以保留画面中建筑的全部细节。“所有斑驳历史的留痕，年代的留痕都能表现出来，非常细腻。而且使用胶片，亮部和暗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兼顾反差，记录地相当真实、全面。”

观众可以从曹建国的照片中，看到诸多过往的历史细节。

有展览观众在观后感中写道：“我注意到了如此集中而典型的上海老房子细节：从屋檐至二楼到底层不同形状的木料花格子窗框，晾衣裳竹竿上的长裤，衬衫与短裤，还有底层人家在天井里硬生生搭建出来的违章灶披间。”

但这样的拍摄方式，使得拍摄进度非常缓慢。因为大画幅相机个头很大，一套设备重 20 多公斤。拍摄一次，光是架好相机这样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往往费时近半个小时。在退休以前，曹建国都是 4 点半起床，赶在 9 点上班之前完成晨间拍摄的。

仅仅是丹凤路这一条路，他就断断续续拍了一两年。他也看到不少使用小型相机拍摄老城厢人文历史的同行。“我咬着牙在拍，是有想回头（的想法），我也想用徕卡去抓拍一些市井生活的环境，因为我太了解老城厢的生活起居，早晨一起来，太阳还没冒头的时候，大饼油条摊头就开始出来了，买菜的、锻炼身体的人出来了。”

直到他在拍摄过程中，看到一个老外也架着同样笨重的大画幅相机在拍，他坚定了自己的初衷。“老外从这么远的地方赶到上海来拍老城厢，我作为一个上海的摄影家，我为什么不拍下去？”

在世博会之前，曹建国完成了《老城厢市井》的大部分拍摄。

三

2017 年开始，曹建国着手拍摄《老城厢人家》系列。

这一个系列开始关注老城厢人家的生活。曹建国进入 90 多户老城厢人家，以采访、录音、手记、拍摄的方式，留下了老城厢住户的人文记录。

该系列的拍摄，曹建国遇到了更多难点。他要先和居委会沟通，拟定肖像权协议，说服居委会和居民。“我带着要为老城厢留下文化、留下历史的诚意，这也许是打动居民的原因吧。”

走入老城厢人家之后，每一张人物与房屋的肖像合影，又都是一次技术考验。

“这个考验厉害了，每家情况都不一样。最小的居住面积大概只有 7 个平方米。我的灯都要摆到他的床上，我的三脚架都架在门外。他的窗户都在走廊里面，我把照相机架在走廊窗户外面，伊拉在里面，我人已经在外头拍了。”

把近 30 公斤的器材，扛上老城厢陡峭的楼梯，本身也是一个难点。“最窄的楼梯大概只有 50 公分，我分批一点点把器材拿上去。”

在室内光线下，需要光源补充，2000 瓦一盏的闪光灯，要用到 4 盏，大功率用电在老城厢有安全隐患。“瓦数太大，老城厢里面的配电箱很小，电表承受力很小，依上去瓦数大的话，拿人家家里保险丝都炸断掉了。”他又跑去照相馆请教师傅，最后把 2000 瓦一盏的闪光灯，换成了 200 瓦一盏的 LED 灯。

拍摄使用 64 的小光圈，快门速度慢。拍摄建筑的时候，曹建国最长会用到 2 分钟，拍人他最慢用到 1/2 秒。即便只是 1/2 秒的时间里，还是没有办法保证建筑和人不晃动。

“很多家人家，地板都在动。走上去，地板都在晃。我自家立上去，我都吓呆。照相机架好后，照相机自己也在晃。”

“还有老年人也会动。有对老夫妻两人都怕金森（患者），手脚在动，眼睛也在动，两个人而且不同频率（在动）。最多的人家，我大概拍了 7 张（才有一张不动的）。”

技术上的难点，也是老城厢居住的现实，局促、不便、有安全隐患。

但最终，那些被记录下来和老宅合影的居民，都对曹建国表示了感谢。有阿姨激动地表示，照片留下了永恒的记忆，是可以传代的物事。

展览也展出了老城厢居民与他们老宅的合影，以及经采访写成的人物经历。

其中，有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烈士李白的遗孀袁慧英的邻居，有人的舅舅曾和蒋经国是小学同学。而居民共同构成的插队落户、下乡、下岗、顶替等经历，也是上海人的共同回忆。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

六幕话剧

杜甫
DuFu

在艺术节，遇见“素”彩人艺

2024/ 上音歌剧院
11.1-3 19:30